

論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划分



苗 晶 乔建中

文化艺术出版社

307
726

论汉族民歌 近似色彩区的划分

苗 晶 乔建中

文化艺术出版社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

苗 晶 乔建中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625字数116,000

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400册

书号 8228·177 定价 1.65元

ISBN 7-5039-0032-6/J·9

序

当我们了解到巴托克、柯达伊在对匈牙利农民歌曲加以系统化整理的过程中把匈牙利民歌的分布划分为若干“音乐方言区”之后，自然会联想到，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整理也需要类似的前提。然而中国地域之大，民族之多，方言之繁，又给我们提出了远为困难得多的课题，尤其对于汉族民间音乐的地区划分，更觉得难于着手。对于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研究者知难而退了。这就延误了系统化整理工作的进程。

苗晶、乔建中同志在对汉族民歌进行全面了解熟悉的基础上，敢于涉足汉族民歌的地区划分这个带有战略意义的专题，这勇气使我钦佩。对于这一研究中的不足，人们大概很容易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对于这一研究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恐怕要到三十年以后才会有广泛的承认。因为对中国当代民间音乐的集成目前尚在编辑中，这一成果中所包含的疑难大概要在十五年之后才会摊在研究者面前。为了动员人力，集成工作的进行，眼下不得不如此：（1）按行政区划而不按照音乐风格本身的区划来分卷编辑。例如：陕北和陕南这两种迥然不同

的风格色彩，含在一卷里，而陕南与川北这样相近的风格色彩反而分在两卷里。（2）不论哪个地区，同一风格色彩的民歌、戏曲、说唱、器乐、歌舞总要支解成五片，分别归入不同的集成卷内。这样的分部办法和分卷原则不能符合对音乐的整理要求。一个“音乐方言区”的民间音乐的完整面貌总是要通过多侧面、多层次的特征描述而作为理论思维的成果呈现于后辈研究者面前的，到必须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们就会问：什么叫一个“音乐方言区”呢？那时人们会在这本探索性的著作中发现一连串现成的答案，因为对民歌色彩区划分的研究给民间音乐的地区划分提供了可靠的坐标。

从方法论上，人们可能会对本书的作者提出指责，认为没有首先做好对音乐的详尽调查，就过早根据音乐之外的因素划了框框。这显然涉及是否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音乐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兼职研究人员，有责任为之辩护。

对地理背景的考察，是否必要？有人可以扣一顶“地理决定论”的帽子，予以否定。但是，只要音乐学研究者承认物质生产方式的特点对音乐风格特色的深刻影响，那么就不能不注意到，地理条件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塑造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的稳定因素，在现代化工业作为普遍通行的生产方式在各个地区取得统治地位之前，由地理所描述的自然条件的这一塑造作用是强大

的，持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重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我们有理由重视对地理背景的考察。

对语言背景的考察，价值如何？对于方言与音乐风格的关系问题，在人们中间可能流行一种误解，以为方言的特色就决定了音乐风格的特色。固然，方言特色与音乐特色常有共生性的联系，尤其在民歌中，民歌的歌词是最富于生活气息的，当地老百姓日常语言的结晶，研究者常常可以凭着歌词或其中的衬词认出歌曲属于哪个地区；但是，密切的共生性联系与相互影响并不等于一方决定另一方。也许可以借助“鸳鸯镜”为比喻来澄清这种误解。方言和民歌都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信息交流手段，好比两面镜子，被两者所反映的则是那个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以及信仰、感情、审美趣味等心理素质的人群的活动和意识，这一社会群体在活动 and 意识方面的共有特征，既反映在那面镜子里，也反映在这面镜子里，但我们不能由于两者相似就断言是那个决定了这个。澄清了这个问题之后，就不致在下述两点上有所偏废：（1）方言的区划常提供重要的借鉴，让我们在划分音乐色彩区时得到参考。（2）方言的区划不能简单地照搬过来等同于音乐风格特色的区划；在“音乐方言区”一词中的“方言”带有类比的意味，并非语言学中所讨论的“方言”本身。

基于上述的剖析，我本人在重视地理、语言背景的

同时，常更多考虑到古代文化背景和人口迁徙历史。这也涉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考察结果发现，在东北、西北、西南三大区域中，都呈现出内外的差别。所谓“内”是指，文化交流的结果以汉民族原有的特色为主导而融合了他民族的文化因素；所谓“外”则是指，通过文化交流大量吸收了他民族的成分而形成非固有的新特色。具体地说：（1）在东北部，以燕山山脉为界，分内外两区，这也就是本书所说的两个支区；（2）在西北部，以贺兰山、六盘山一线为界，分内外两区，也是本书所说的两个支区；（3）在西南部，以大娄山、大凉山一线为界，分内外两区，本书在讨论人口迁徙时提到的云南民歌“不同于南北的特色”正可以说明其“外”区特色的历史缘由。

“汉族民歌十四区地图”的形成，会对浩瀚的汉族民间音乐的分区整理提供相当牢固的基础。当然，有些疑难不免还会发生，不过到那时大多数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预祝苗晶、乔建中同志的开拓性、创造性探索成果迎来我国民间音乐系统化整理工作的新篇章。

赵宋光

1986年5月于广州白云山麓

目 次

序	(1)
---------	-------

引言	(1)
----------	-------

上 编

划分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背景依据

一、汉族民歌分布的地理背景	(9)
二、汉族民歌产生的早期古代文化背景	(18)
三、汉族民歌分布的语言背景	(26)
四、汉族民歌分布的社会背景	(33)
五、汉族人口变迁与民歌的传播	(41)
六、汉族古代民歌流传过程中的地域区划	(46)

下 编

各近似色彩区的划分及其基本特征描述

一、综述	(57)
二、东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	(62)
三、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	(76)
四、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区	(92)
五、江浙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	(101)
六、闽、台民歌近似色彩区	(116)

七、粤民歌近似色彩区	(129)
八、江汉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	(141)
九、湘民歌近似色彩区	(155)
十、赣民歌近似色彩区	(169)
十一、西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	(179)
十二、客家民歌特区	(191)
结语	(200)

附：汉族聚居区分布图	(16)
水系流域分布图	(17)
山脉示意图	(17)
新石器时期氏族文化区域图	(25)
汉族语言分支区域图	(32)
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区划图	(60)

引 言

本书想就目前已经受到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广泛注意的一个课题——汉族民歌的分布与区划，作一初步探讨。

按照种族、地理、文化背景或体裁、风格等，把大至全世界、小至一个民族的聚居区的音乐文化分成若干区域，是比较音乐学研究当中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如当代著名的美国音乐学家阿兰·洛马克思就主张把全世界音乐分做六个大区、三个特区^①。同时，每个大区又可分做若干小区，小区之下，还可再分。这样就能够于宏观之中鸟瞰全世界或一个局部地区音乐文化的总貌。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在世界上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汉族民间音乐，由于有数千年的积蕴，又分布在一块地理、地形、气候异常复杂，东、西、南、北

① 六个大区为：北美（主要指美国，也包括加拿大）；南美（包括整个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欧洲；非洲；古老优秀文化（中国、印度等国）。三个特区是：印度原始居民；北极；澳洲。——转引自《音乐研究》，1983年第2期《欧美音乐学研究情况》一文。

这种划分法还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一是未提阿拉伯地区；其二是把中国和印度划归一区，也有些过于笼统。——著者

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各地音乐风格、品种的多样和差异，真如千花百卉，色彩斑斓。其分布与区划，自然也就呈现出纷杂、多变的局面。那么，汉族民间音乐的分布结构与状貌究竟如何？它同自然、社会、经济及文化历史等因素有什么联系？到底应以什么为划分依据？如何划法等等，就成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汉族民歌在整个民间音乐中具有基础意义，本书拟先从这一品种入手，日后再旁及他类。

诚然，三十余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的民歌研究工作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的，出现了一部分较有深度，有见地的专著或专论。但也应看到，它们大多数偏重于对某一省、区，某一地区的民歌或某种体裁、歌种的艺术规律的探讨。也就是说，限于研究者本人所处的环境条件，其涉猎范围一般不跨越行政区划，往往是就地选题，向纵深开掘。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如何立足于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总结某些整体性的规律，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我们选择分布与区划这个专题，拙意正在于拓展以往的研究领域。再者，现代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跨学科的研究，通过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有关自己研究领域内的问题。因此，现代民族音乐学在方法论上一个主要趋向，就是特别强调民族民间音乐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自然、社会之间多方面的联系。它要求人们不要把民歌视为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应把它同植根于它的

土壤即文化背景看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广泛吸收文化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乃至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科际的分析研究。唯其如此，才能充分揭示民歌流传分布的内在规律及其全貌。从而，也将给今后研究整个汉族文化史的发展，带来某些积极的影响。

除上述诸方面外，在探讨问题之前，我们还想指出以下几点：

（一）我国近现代汉族民歌的分布格局约在明、清之际即已形成，它是民歌本身数千年来逐渐积累、流变、发展的结果。对于它，人们尽可以以各种依据，从不同角度考察、分析并作出各自的区划。如地理的（山区型、平原型、海滨型等）、水系的（黄河、长江、珠江等）、社会经济的（城镇、农村）、行政的（东、西、南、北、中），以及体裁、题材的等等。我们则认为应该主要以风格色彩作总的依据。为什么？因为包括民歌在内的民间音乐各种类型，几乎都有各自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特征是交融于每件作品中的一种“自然属性”。总而言之，各种外在的客观因素对民歌的种种影响，不同地区间民歌的差异，最后都要通过不同的风格色彩表现出来。因此，风格色彩也就成了确定民歌流传区域划分的关键因素。当然，体裁、品种的地方性差别，也是区划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二）所谓“色彩区”，即指在音乐风格方面具有

某些主要共同性特征的民歌流传区域而言。但同一民族中，任何地区民歌的风格色彩又不是完全单一的，不是“纯”而又纯的。这是因为，民间音乐的相互交流、传播，几乎随时都在发生；因为人口迁移、社会变革、战争纷扰而使某些民歌或某一歌种“搬家”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再说，每一地区的风格色彩，都是长期地在民间音乐的新陈代谢、相次更迭中形成的，其中融合了许多代的因素。因此，在具体划分时，只能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被划作一个分布区者，只能说彼此之间相近相似，而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一律。我们用“近似”一词加以限定，一则是从实际考虑，同时也为了使它更符合科学性。

（三）任何民族的民间音乐风格的生成背景，都是异常复杂的。而对汉族来说，之所以形成若干个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近似色彩区，又有它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①，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从地理、地形来看，汉族聚居区具有多水系、多山脉、多种地形、多种气候等特点。每个水系在文化上都有其独特的风貌，而在这当中，多种走向的山脉又似天然屏障，使一些地区彼此相隔，成为相对独立的区域。再就古代文化而言，正是由于上述地理背景，

① 见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四页（正中书局出版，1948年第7版）。

使我国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多元的，多中心的特征，各个区域都有其各自文化面貌的地域特点。值得一提的还有汉语方言。众所周知，汉语的方言分支之多，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形成于一系列客观的因素，但它多样化的、复杂的音调、声调、音色又给其他文化形态，特别是民歌以强烈的影响。除了这几方面外，还有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变迁等因素。凡此，都是促使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形成的条件。在这些因素中，有的是相对稳定的，有的是不断变化的，有远的背景，也有近的背景；有的起直接作用，有的是间接发生影响。对于这些客观因素，我们都将在下文中逐一剖析，充分地估量它们对于民歌近似色彩区划分的作用，并根据汉族民歌的分布现状，提出我们的区划。

（四）由于民歌分布本身具有非行政区划的特征，所以我们是主张不受后者的约束与限制的。但是，行政区划仍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参照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区划中的地理条件占有较重要的位置。其次，行政区划又形成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地和交通网道，这一外在因素对民歌的流传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行政区划，我们的原则是：既参照又不受其限制；实际的情况也是二者既有吻合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

（五）还须指出的是：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有的省、区也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某些歌种甚至是汉族与

少数民族共同传唱的，如西北的“花儿”，鄂西南土家族民歌、浙江畲族民歌等，都是多民族互相交融、渗透的产物。当然，从总的方面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要普遍一些，也大一些。但从局部看，也有相反的情况，如“蒙汉调”等。因此，在进行具体划分时，一定要加以分析，不可混淆各民族之间民歌的界限。

（六）在我们划定的各个近似色彩区中，大都流传着多种体裁、形式的民歌，它们以不同程度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本地区的风格特色。但是，由于一些体裁如传统小调等与外区交流较多，同一曲目可能传播于各地，因此，它们的地域特色並不显著。我们在分析、判断各色彩区的风格特征时，常常是更多地以那些最具有本地特色的体裁或歌种为主要依凭，对于全国普遍流传的曲目，仅作参考因素。

上 编

划分汉族民歌
近似色彩区的背景依据

